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从历史传承  
领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民性

谢承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奠定人民性的初心底色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当时，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散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军民关系。在江西遂川荆竹山，毛泽东同志向部队宣布了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条纪律用最朴素的语言划清了工农革命军与剥削阶级军队的界限；这支队伍不是来掠夺的，而是来保护群众的。这便是“三大纪律”的雏形，也是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权力与群众的关系。

随后，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三大纪律”逐渐完善，并增加了“八项注意”，从衣食住行到言行举止，全方位规范着军队与群众的互动，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转化为行为准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战士严格践行这些纪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

正是这种“把群众当亲人”的作风，让党在最艰难的岁月里赢得了民心。在中央苏区，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粮、送信、掩护伤员；在长征路上，彝族群众为红军带路，藏族群众为红军提供青稞；在延安，老百姓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把党比作救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是纪律条文，更成为党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它用铁的纪律保证了党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为作风建设奠定了“纪律严明、服务群众”的基因，成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源头。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作风建设对人民性的  
继承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着“进京赶考”的新考验。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本质上是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这一时期，作风建设的核心依然是维护群众利

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人民性”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2012年出台的中央八项规定，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为核心，看似针对具体作风问题，实则是对党的人民立场的时代诠释。从历史维度审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百余年奋斗中坚守人民性的生动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回应着人民的期盼，彰显着党“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赤子之心，充分体现了人民性。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我们党先后发起了整风和整党运动。1952年，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因利用职权挪用国家救灾款、治河款等，涉案金额巨大，被判处死刑，彰显了党在执政初期“不管职位高低，违纪必严惩”的坚定决心。同时，推出了严守群众纪律的典范“南京路上好八连”，心中装着全体人民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这一时期的探索，核心是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了历史镜鉴。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现象有所抬头。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周恩来同志在河北邯郸农村调研时，盘腿坐在农民的土炕上，听他们抱怨“吃不上饱饭”，随后推动了农村政策的调整。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大队调研18天，住在猪圈、铺草席、睡门板，扒开人粪查看人们生活情况，实事求是解决了一系列生产生活问题。这些实践延续了“三大纪律”中“密切联系群众”的理念。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作风建设对人民性的  
拓展与制度化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考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有所抬头，“政绩工程”“形

象工程”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新的形式出现。

针对这些问题，党不断创新作风建设的方式。1980年，中央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党的十六大后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十七大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些举措证明，作风建设始终将“人民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一时期的实践证明，作风建设既要应对新问题，又要传承“人民至上”的内核，为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积累了制度与实践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人民性  
的时代诠释

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央八项规定的提出，在具体的实践中衍化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为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正是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性的精准传承和时代诠释。

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厉行勤俭节约”，这是对群众利益的坚守。“三大纪律”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厉行勤俭节约”，本质上都是严禁损害群众利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严格控制因公出国(境)经费，严格执行住房用车”等规定，正是通过约束权力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让群众感受到“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

特别是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违规吃喝问题，全国范围内查处了一大批违规案例，让群众感受到：党依然像革命年代那样，坚决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允许任何人侵占公共资源。

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到“改进调查研究”，这是对群众呼声的回应。196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其本质是坚持群众路线，确保党的决策符合群众利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改进调查研究”“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本质是保证党的决策倾听群众呼声。革命年代，党的领导人深入田间地头，听群众说“我们需要土地”，于是制定了土地革命政策。新时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干部走出办公室，听群众说“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医疗”，于是推动了“双减”政策、医疗改革等民生举措。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后，这种“听群众心里话”的作风，与革命年代“红军问群众冷暖”一脉相承，都是通过贴近群众来实现“决策为民”。

从“借东西要还”到“改进工作作风”，这是对群众信任的维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改进工作作风”一样，核心都是通过办实事赢得群众信任。革命年代，红军借了老乡的门板及时归还，群众才会相信“这支队伍说话算数”。新时代，党员干部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精简会议”，把时间用在解决田地灌溉、调解矛盾纠纷等难题上，群众才会相信“干部是来干事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领悟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民性，持之以恒贯彻落实，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不断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

试以『六力』构建  
新时代基层治理人才核心素养体系

刘卫平 陈立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群众诉求日趋多样、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基层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坚持党建引领、人民主体、多元协同，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此背景下，构建一支具备政治引领力、文化感知力、问题化解力、服务创新力、治理协同力和数字应用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政治引领力：基层治理的“定盘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是党建引领。而政治引领力是党建引领的关键，也是基层治理的“灵魂”。这对于基层治理工作者来说，是“第一标准”“首要能力”，体现为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在复杂环境中坚定方向，在治理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在群众工作中强化思想政治引导、传播主流价值观。近年来，我省推进的“党建+基层治理”模式，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南样本”。通过建立党员联系户制度，设立“红色网格员”岗位，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例如，长沙县推行“党建聚合力”工程，将党组织建在小区、楼栋，推动党员亮身份、践承诺，有效提升了群众对基层治理的信任度与满意度。这种“支部建在网格上”的做法，确保了政策执行不偏向、服务群众不走样，实现了“党的领导”与“群众自治”的有机结合。

**文化感知力：基层治理的“润滑剂”。**文化是实现基层善治的“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在治理实践中，文化感知力体现为基层治理人才对地方知识、风俗习惯、社情民意等具有深刻的理解能力、洞察能力和运用能力，能立足地方实际，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优秀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传承与基层治理创新的融合；善于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通过身边榜样示范、生活礼俗教化等，引导群众明是非、知荣辱，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湖南文化底蕴深厚，各地因地制宜利用本地文化资源提升治理效能，取得了良好效果。如湘西州基层治理工作者挖掘“寨老调解”“歌会议事”等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既维护了民族团结，又增强了治理的文化认同感，实现了文化治理的有机融合。岳阳市推行“村规民约积分制”，将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孝道等内容融入治理指标，激励群众参与自治，获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这些做法，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中“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生动实践。

**问题化解力：基层治理的“金钥匙”。**问题是治理的“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基层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基层治理涉及民生、环境、治安等多领域，问题多样且复杂，更要求治理工作者具备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治理实践中，问题化解力表现为基层治理人才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时，能够迅速识别出症结所在，从千丝万缕中找出“线头”，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便及时化解矛盾、处理问题，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株洲市在基层治理中开发的“风险隐患排查App”通过网络参与，实现了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有效提高了识别问题、化解风险的能力。这种“科技赋能+群众参与”的模式，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中“预防为主、调解优先”化解基层矛盾的具体体现。

**服务创新力：基层治理的“驱动器”。**服务、造福群众是基层治理的出发点落脚点。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对基层治理人才来说，服务创新力就在于能够创新服务群众的内容、方式、方法，不断优化服务供给，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将党和政府的温暖更有效地让基层群众感知，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服务创新力要求突破传统服务模式，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基层治理人才在服务过程中大胆创新，探索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模式。如，衡阳市“幸福敲门”项目通过“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志愿者接单”机制，为特殊群体提供精准化服务，提升了群众满意度。这种“需求导向、服务精准”的做法，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服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新实践。服务创新力要求突破传统

服务模式，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治理人才大胆创新，探索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模式。

**治理协同力：基层治理的“黏合剂”。**协同是基层治理的“关键招”。在现代社会，许多公共问题都具有高度复杂性和跨界性(如气候变化、城市拥堵、公共卫生)，单靠某一个部门或组织难以解决。基层治理涉及多主体、多领域，要求治理人才具备较强的治理协同力。在具体实践中，它体现为较强的协调和整合能力，通过促进不同主体(如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众等)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整合政府、社会、市场、群众等多方力量，链接多方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增强治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实现基层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例如，郴州市引入专业社工机构运营“儿童之家”，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协同治理格局。这种“多元共治、资源整合”的做法，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中“群防群治、人人参与”的深化拓展。

**数字应用力：基层治理的“新引擎”。**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促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手段现代化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基层工作者必须具有较强的数字应用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技术操作层面的能力，更是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应用场景的设计、数据的分析与应用以及数字化思维的综合体现，是适应并胜任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必备素养和技能。它通过运用数字技术、数字工具和数字资源，能够有效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方式和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如，怀化市“基层治理四平台”整合各类治理资源，实现了“一屏统管”，大幅提升了治理效率。这种“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的做法，体现新时代“枫桥经验”中“科技支撑、高效便捷”的现代转型要求。

(作者分别系湘南学院党委副书记、博士、教授，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社会工作”建设点带头人；湘南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韧性治理体系优化及实现路径研究”(23BSH065)阶段性成果)

新论

## 论点荟萃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本版今日起推出“论点荟萃”栏目，精选当前理论研究的好论点，以开眼界，以饜读者。敬请关注。

## 开放也是重要的营商环境

王孝松

开放与国际化合营商环境具有高度统一的内涵。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关键要素，开放性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对我国来说，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不仅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而且有助于吸收先进技术、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机遇，促进经济繁荣，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就是重要的营商环境。(摘编自8月12日《经济日报》)

## 让过紧日子在制度刚性下成为习惯

闵尊涛 刘佳敏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有了不少“增量”：既从一餐饭、一杯酒等细微处抓起，明确要求“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也直指决策失误这一“最大的浪费”，“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从严从紧控制非重点、非刚性、非急需支出。

要拿起手电筒“既照他人也照自己”，让纸面规定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过紧日子成为一种习惯和风尚。(摘编自6月26日半月谈网)

## 务虚不能“虚”，务虚的价值在于“求是”

张珂

务虚虽带有“虚”字，实际上恰恰不能“虚”。有些地方、个别干部理解片面，将务虚等同甚至歪曲为空谈清议，满足于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最终导致虚功泛滥、实绩寥寥，滋生形式主义，破坏了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因此，党员干部要准确把握务虚的本来，既重务实、又善务虚，就实论虚、以虚率实，掌握好务虚这一重要方法论，更好推动工作。务虚的价值在于“求是”。(摘编自8月13日《人民日报》)

## 守正创新，做好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

赵超军

## 思想经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主流媒体是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的重要阵地，必须勇担使命，坚持守正创新，聚焦主题主线，打造精品力作，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

近年来，湖南教育电视台作为湖南省电视理论宣传基地和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示范点，以提升主流媒体的主流价值为抓手，以“更专业、更专业”的办台理念，致力打造青春永驻的“教育高地、思想高地和红色阵地”。在宣传格局上，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有点潮”》等为代表的理论思政、以《奋斗青春号》《为时代育新人》为代表的高校思政和以《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为代表的中小学思政的思政宣传“三驾马车”。从这些实践经验来看，用电视艺术形式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阐释，须求真务实、守正创新，在主题、内容、形式、传播上下功夫。

一是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作为新闻工作者，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自己要学深悟透，还要身体力行、落到实处。要保持鲜明的政治底色，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到情感上认同、理论上透彻。

二是在深入人心上下功夫。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其中强调“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思想文化宣传，重在润心。好的宣传内容就要体现思想性，唱响主旋律，培养大人格。在内容上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结合到实践中去，既讲宏观理论，又有微观实践，让理论有形、有感、有力。创新叙事风格，以小人物、小故事、小切口，反映大主题、折射大时代，讲好新时代故事。要以鲜明的效果为导向，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注重选取感人的、紧贴时代脉搏的故事素材，讲事实、讲思想、讲情感，在故事中嵌入思想、承载价值、回应关切，让观众有所获、有所得，达到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效果，充分发挥思想文化的引领作用。

三是在做新活活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时代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十分生动的，我们的学习也应该是生动的。当理论宣传遇上“视听革命”，电视理论宣传如何能做到不落俗套、引人入胜？创新表达、改进文风至为关键。这就要善用新技术，比如，虚拟场景、时空对话、AI数字技术等。设计多维度的沉浸式场景，让人物故事“活”在眼前；创新内容形态变革，进行交互式参与设计，把“旁观”变“共创”；重构话语体系，创新叙事风格，把“大道理”变成“热梗”，打破“说教感”，实现宣传话语与大众话语无缝对接，使话语表达更加清新朴实、生动鲜活。只有当科技让文化“可触摸”，当语言让理论“可共鸣”，当形式让思想“可践行”，宣传工作才能真正走进人们的心里。

四是在传播方式上下功夫。“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网上传播提供了深刻而科学的方法论指引。进入新时代，随着媒体环境的深刻变化、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必须坚持移动优先、融合传播。在目标受众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分众化、差异化传播；在传播形态上，做到围绕一个主题进行多样化、轻量化传播；在传播平台上，实现台、网、微、端等各类平台多元、交叉传播。要深入研究和把握传播新趋势，充分统筹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新形式的立体传播方式扩大覆盖面，提升影响力，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作为新闻工作者，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业，唱响主旋律；必须始终以奋发有为、积极作为的精气神，用心用情用力履职尽责；必须以创新理念和创新举措，努力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有情怀的精品力作。(作者系湖南教育电视台党委委员)